

郭良平专栏

过去30年中国政局的稳定和各方面的进步，是世界上的一条独特风景线——习近平用“风景这边独好”来形容。西方想当然地认为，稳定是靠高压和超军费的维稳支出实现的。但长期稳定还伴随着长期高增长和中共政权的高支持率，这就不那么简单。中共称之为“奇迹”，既非自吹自擂也非弄虚作假，而是被哈佛大学和国外一些权威调查机构多次证实的。但近来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信号，标志着中国政治的性质和基本特点正在发生嬗变。

不寻常的信号

数月以来，大陆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，是政府公信力的下滑。以前也有不少公共事件使人质疑政府，但从未在根本上动摇中央的权威。这次的情况有些不同，一连串事件似乎勾勒出一个整体性的转变：从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的爆料到他的去世；从关于武汉中心医院传染科主任经历的一篇被官方删除，但又以各种语言译文、拼音、竖排版、甲骨文、盲文、文言文、篆书、摩斯密码等等创意版本，不断在网上冒出的报道，到突如其来“白纸抗议”，再到去年底仓促的解封和随之而来的疫情泛滥和大批死亡。

最近的是“鼠头鸭”事件：江西一个大学食堂菜里出现了一个老鼠头，而当地食品安全部门却鉴定为鸭脖，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网民都看到了视频和照片。在舆论大哗下，省里的联合调查组又将其鉴定回鼠头。之后许多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推出“鼠头鸭”的纪念品，但一夜之间又销声匿迹，显然是接到了禁售令。这个事件虽然发生在地方，但由于全国官员和官僚机构面临着同样的激励结构——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，于是就有了普遍性，成为网民对政府冷嘲热讽的话题。一个网民如此评论：“指鼠为鸭事件造成的影响属于地震级别，公众原以为各部门都会从中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敬畏公权力，慎用公权力。看来，大众还是太高看某些部门了，他们死不悔改变本加厉的德行，让人彻底心寒了。”

最重要的是，网民开始公开挑战中央权威，毫无敬畏地反驳官媒的观点和评论。例如四川大学研究生张薇发帖欺凌农民工，却被《人民日报》称为“乌龙事件”，引起网民极大不满。类似事件不断出现，造成政府公信力和道德权威的动摇。这在民主国家是家常便饭，但发生在中国则意义深远。

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和方式同西方不同，很难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术语。比如，西方常用

无论怎样鼓吹“马克思主义行”，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下，人类社会甚至人类本身的前途都在悬空。是坚持一个诞生于150年前的正统、一条道走到黑呢？还是对未来采取实事求是的开放态度？真正实行全过程民主，就必须进行大幅度政改。

在中国的标签“威权主义”，概念漏掉了中国传统政治里很重要的一面：政府的道德权威。道德和权威连在一起，是儒家统治理论的特点。帝制时期的政治有“专制主义”的性质，因为它强调了皇权之绝对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法家的严刑峻法主要用来维护统治而不是公正；恐惧被广泛应用来树立皇帝和上司的绝对权威。

旧政治模式

但传统政治也注重儒家的“仁政”和以德治国的理念。尽管这些对皇帝和权臣个人来说是软约束，但仍有必要用来维护朝廷的形象，否则它就会失去“天命”。以德治国注重榜样的作用：尧、舜、禹、关公、岳飞；老莱子娱亲和二十四孝故事；举孝廉和立贞洁牌坊等制度都体现了儒家的理想。正因为有了这些传统标准，才有了谏官制度和“文死谏、武死战”的行为准则。

到了共产党时，这套古典交响乐有了新的变奏。在改革开放前，现代的“极权主义”（totalitarianism）取代了旧时的“专制主义”（absolutism），这是因为大革命彻底推垮了传统社会，中共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，就必须从思想到言论行为上控制一切，以打造“社会主义新人”。这是个乌托邦工程，毛泽东尽其毕生的努力，也未能建立起传统政治的替代系统，反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大跃进和文革的浩劫。

这个从苏联引入的极权体制，在权力结构上保持至今，而且立誓“不该改的坚决不改”。

在这个体制下，执政党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比旧专制严密得多。动员和运动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运作方式，强调的是在党领导下的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纲领、统一行动。传统的以德治国演变成榜样治国，即不断根据需要树立英模典型，如白求恩、张思德、雷锋、焦裕禄、邢燕子、张海迪、孔繁森等等，用毛的话：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”传统统治术里“恐惧”的功能则由“无产阶级专政”来体现，臻于文革的红色恐怖。

但是，用来运作极权模式的庞大官僚体系，造成与毛泽东革命目标截然相反的结果——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，毛称之为“新生资产阶级”。毛的反应殊可预料：发动群众造反。然而这不是长久解决方案，因为它是破而不是立，把

党组织也破坏得七零八落。毛去世后，尚未能够在“拨乱反正”中全面恢复的党组织，又被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，冲击得面目皆非。这就是过去10年习近平大规模整党和党建的背景。

习同毛的目标一致：防止执政党堕落为脱离群众的特权阶级，最终像苏共那样被人民抛弃。但他的方法不是发动群众造反（也许同他是文革受害者有关），而是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：一条是建立严密制度下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和问责，另一条是恢复党员干部的信仰。两条腿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，以至于他不得不重新引进中华文化传统，与毛反其道而行之。

新社会基础

当代中国是个市场化了的社会，与为了计划经济和改造人而设计的旧体制有兼容问题。

过去10年的改革，在细节和大政方针上有创新，但在基本权力结构和党国与社会的关系上，仍然守旧。第一条腿遭遇的困难是，在大规模集权下，严密的制度和监督、追责，压缩了地方和干部的自主空间。他们在反腐运动的威慑下大批躺平、不作为，使中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创新引擎。

第二条腿遭遇的困难是，市场的激励机制同共产主义理想也存在着兼容问题。即使在毛时代，中共推行的大公无私、为人民服务、对党忠诚、斗争和献身精神等信仰，也都没有渗入文化、达到儒家标准的制度化程度，使塑造“社会主义新人”成为空中楼阁。先锋党的前瞻性同孔孟之道的保守性形成鲜明对比，后者能够提出统一标准而前者太抽象、无法制度化。市场法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渗透社会后，就会造成缺乏共识。当党员身份相对于人们的工作、职业、事业和其他身份下降为第二、第三位时，当执政党不再垄断社会所有资源和机会时，就很难对党员干部（近1亿人的群体）提出极权体制下的那种高标准、严要求。“白纸抗议”中的年轻人，以及社会上的追星族、蚊族、北漂族、躺平族等，同党期待的“共产主义接班人”风马牛不相及。这就是社会现实。

此外，无论怎样鼓吹“马克思主义行”，在人工智能（AI）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下，人类社会甚至人类本身的前途都在悬空。是坚持一个诞生于150年前的正统、一条道走到黑呢？还是对未来采取实事求是的开放态度？社会的新一代教育高、见识广，

且生活中有足够空间和自主性来形成独立见解，官方权威不再占有高地优势，遭到质疑是必然的。同理，无论如何反复强调“四个意识，两个维护，两个确立”和“定于一尊”，企图再造“伟大领袖”的权威和敬畏，都是徒劳的，因为中国政治正在经历世俗化的转型。

政治转型的要点

这个不可避免的转型有几个关键点，把握好了就能引领新的政治文明。

第一关键点是避免掉入西式选举民主的泥淖。政府缺乏道德权威是西方政治动乱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究其根源，无止境的自由与平等，造成不妥协的身份政治和社会撕裂、意识形态走极端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如果出现有人指着领导人鼻子臭骂，当众扇总统耳光（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遭遇）等大不敬的现象，就会造成巨大混乱和国将不国的态势。文化大革命“打倒一切，全面内战”的浩劫，就是权威扫地的结果。在一个后现实、后真理的自媒体时代，可靠的道德权威非常珍贵，但怎样树立和维持它，是个巨大的挑战。

第二是恐惧在统治术中的地位。恐惧是传统统治术的核心，也在中国现代政治中广泛运用。但传统帝王那种绝对权威行不通了，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反弹。去恐惧必然导致领导能力的转型——领导人必须学会其他政治技能来取代暴力恫吓。

这方面新加坡的转型很有启示意义。建国总理李光耀从日本占领当局那儿认识到了恐惧的效力；他曾说，如果没人害怕我，我就一钱不值了。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选情紧急时，他用老办法来威胁倒向反对党选区的选民，但起了反作用。李显龙总理赶快出来解释：“这不是我们（这一代）的风格。”他在2013年国庆大会讲演中用三首流行歌来形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。第一首：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”；第二首：“我在你左右”；第三首也是最重要的：“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”

第三，压服不灵了，就只能以理服人和推行法治。这须要达成像儒家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的共识和统一标准——恐怕也是中共拥抱文化传统的原因之一。现代社会的共识只能通过中共所说的“全过程民主”来达成，并取代恐惧成为道德权威和评判标准的基础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，无法取得“和为贵”的儒家经典在古代那样的全面指导地位。真正实行全过程民主，就必须进行大幅度政改。这牵涉到民主转型和重新构思政府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——都是目前创新不足的领域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